

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（古典文獻與語言文字）

歐人之漢學研究

〔日〕石田幹之助・著 朱滋萃・譯



國家出版基金項目
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SERIES OF
CLASSIC OVERSEA
STUDIES ON MODERN
CHINESE CULTURE

山西出版傳媒集團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歐人之漢學研究

〔日〕石田幹之助◎著 朱滋萃◎譯

山西出版傳媒集團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歐人之漢學研究 / [日]石田幹之助著;朱滋萃譯. —
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,2015.12
(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 / 鄭培凱主編)
ISBN 978-7-203-09367-1

I. ①歐… II. ①石… ②朱… III. ①漢學—研究
IV. ①K207.8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5)第276312號

歐人之漢學研究

叢刊主編 鄭培凱

著 者 [日]石田幹之助

譯 者 朱滋萃

責任編輯 張 潔

出 版 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

郵 編 030012

發行營銷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(傳真)

天貓官網 <http://sxrmcbs.tmall.com> 0351-4922159(電話)

E-mail sxskcb@163.com 發行部

sxskcb@126.com 總編室

網 址 www.sxskcb.com

經 銷 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廠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·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

開 本 700mm×970mm 1/16

印 張 22.75

字 數 168千字

印 數 1—2000冊

版 次 2015年12月 第一版

印 次 2015年12月 第一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203-09367-1

定 價 68.00圓

— 總序 —

溫故而知新

晚清以來，西力東漸，西方文化思想的著作也大量譯成中文，最著名的如嚴復與林紓的譯著，影響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知識界與文學界，使得中國文化的思維脈絡爲之丕變。除了西方思想經典、文學與實證科學著作的翻譯，以實證方法系統化探討中國文史的域外漢學，也對中國學術思想界產生了莫大衝擊，改變了中國學術的著述方法與取嚮。

中國傳統的知識結構，是按經史子集四庫分類的，以儒家意識形態的經學爲文化知識的砥柱，以史學爲貫串歷史經驗的殷鑒，至於子部與集部，則是作爲保存文獻、擴大知識面的附帶知識，可以耽情冥想，可以悠遊玩賞，却都是邊緣化的知識，無關聖教的弘揚，無關文化精髓的宏旨。西方文藝復興之後的現代學術體系，在知識分類上，與中國傳統大相徑庭，講究系統分科，不同知識領域各有其客觀存在的價值，有其相對獨立的目的與標準。日本知識界在明治維新以來，鑒於東方文明落後於西方的船堅炮利，率先效法西方，在追求“文明開化”、“脫亞入歐”的過程中，爲日本學術發展循着現代西方的體例，建立了哲學、文學、歷史學、經濟學、法學、商學、物理學、化學、地質學、醫學、農學、工程學、植物學、動物學等等新型學科，企圖與西方學術齊頭並進，從而影響了中國

近代學術體系的發展。

本叢刊選印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版的漢學譯著近百冊，分爲三大類：“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”、“古典文獻與語言文字”、“中外交通與邊疆史”，反映民國時期學術界重視西方及日本漢學研究的成果，藉助他山之石，重新審視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意義，特別是開拓了傳統學術忽略的領域。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，中國學者如蔡元培、胡適都提倡“整理國故”，以理性實證的方法，對中國文化傳統做出系統化的研究，是與這些漢學譯著相輔相成的。這些譯著除了介紹域外漢學的成果，還引進了嶄新的學術研究方法與視角，有助於梳理中國文化傳統的脈絡，重新整合知識結構與學術體系。雖然這些學術著作不是中國學者的成就，無法納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史學術的主脈，但是從中文譯本的影響而言，起碼也應當視爲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支脈或潛流，不容忽視。可惜的是，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，因爲兩岸政治形勢的變化，這些漢學譯著，除了部分因王雲五重新入主臺灣商務印書館，而得以在臺灣做了少量的重印，在大陸的出版界，則完全受到遺忘，甚至在許多新成立的大學圖書館中也不見踪影。我們搜集了近百冊塵封的漢學譯著，呈現給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學術界，一方面是爲了銘記前人爲推展學術而做出的努力，另一方面也是爲了提醒新常態時期的學人，學術發展有其歷史累積的脈絡，可以從中汲取歷史經驗，溫故而知新。

說到“溫故知新”與這批早期漢學譯著的關係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思考，以見翻譯域外漢學如何反映了時代精神，爲融匯東西方學術思維，重新闡釋中國文化傳承，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。一是域外漢學的研究對象，以中國歷史文化典籍爲主，屬於中西文化碰撞期間興起的“國學”範疇，與五四新文化人物提倡的“整理國故”運動若合符節。研究中國歷史文化，並賦予新的學術意義，是清末民初知識精英念茲在茲的心結。歷史發展走到一個環節，時代的狂風揚起了批判傳統的大旗，風中的英雄幫着推波助瀾，却又無時或忘自己民族文化主體的未

來，糾纏於“傳統”能否“現代”的困境。域外漢學的出現，以西方實證方法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傳統，綜合東西方各種語言文字材料，擴大了研究國學的眼界，即使無法打開中國文化傳統是否走到盡頭的心結，至少是提供了一個解惑的方嚮，在大霧瀰漫的夜晚，看到了依稀渺茫的星光。

二是翻譯域外漢學，有一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吊詭作用，逐漸化解了中國文化思維中的自大心理與封閉心態，讓唯我獨尊的國粹基本教義派解除武裝到牙齒的盔甲，轉而吸收並接受西方實證研究的學風。民國期間新式教育制度的推行、學術體系的變化、大學學術專業的創建，具體到北京大學國學門的成立，中央研究院規劃歷史、語言、考古的研究領域，都與翻譯域外漢學背後的旨意是息息相關的。因此，重新閱覽這批民國期間的漢學譯著，對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學人來說，溫故而知新，不但可以窺知民國學人追求新知的心理狀態，也會刺激吾人反思，認真思考學術研究方法與中國學術發展的前景，更進一步，探索文化傳統的重新闡釋與新知介入的關係。知識體系的變化當然與傳統的重新闡釋有關，是外燠的影響大呢，還是內因變化的成分居多？

《論語·為政》記載孔子說：“溫故而知新，可以為師矣。”歷代解經，對這個“為師”的道理，有兩種相近似但又取嚮不同的解釋。朱熹《四書集注》說：“故者，舊所聞。新者，今所得。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，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，故可以為人師。若夫記問之學，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，故《學記》譏其不足以為人師，正與此意互相發也。”雖然朱熹把知識分為“舊所聞”與“新所得”，強調的却是“學而時習之”，從中生發新的心得，也就是從詮釋舊典中得到新知。這個說法與朱熹在鵝湖之會以後，作詩唱和，寫給陸九淵的詩句，“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涵養轉深沉”，異曲同工，是一個意思，萬變不離其宗，舊學與新知是同一個脈絡的知識學理。

然而，有些朱熹之前的經學家，解釋“溫故知新”，却有不同的取嚮。皇侃

《論語義疏》就說：“故，謂所學已得之事也。所學已得者則溫尋之不使忘失，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。新，謂即時所學新得者也。知新，謂日知其所亡也。若學能日知所亡，月無忘所能，此乃可爲人師也。”皇侃明確說到，“故”指的是過去所學的知識，而“新”則指的是新近學到的知識，新舊結合，相互發明，就可以“爲人師”了。邢昺《論語注疏》循着皇侃的思路，也說：“言舊所學得者，溫尋使不忘，是溫故也。素所未知，學使知之，是知新也。既溫尋故者，又知新者，則可以爲人師也。”這裏講的“素所未知”，就不祇是研讀舊學，有了新的體會，從過去的傳統中發展出的“新知”，而是從來沒聽過、沒想過的新學問了。這種“素所未知”的新學問，結合“舊所聞”，對習以爲常的知識框架，就會產生巨大的衝擊，而出現飛躍性的結構變化。知識內容或許大體沿襲傳統，知識結構却得以重新整合，出現嶄新的認知系統，重新審視自己文化傳統的意義，打開文化傳承的新局面。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漢學譯作，就發揮了這樣的作用，促使中國學者放棄自我中心的文化態度，從各種不同側面，探知中國歷史文化的光譜，以域外（或是全球）的角度觀測中國傳統，搖動了文化的萬花筒，看到七彩繽紛的中國。

嚴復在甲午戰爭之後，改良變法思想風起雲湧之時，開始大量翻譯西方思想經典著作，是有感於國人（特別是傳統文化孕育的知識精英）思維系統封閉，企圖介紹實證新知，引進邏輯思維的方法，以破除儒學之道“一以貫之”與“放之四海而皆準”的虛妄。他翻譯《天演論》，在序文中提到，有人歸納東西方學術思想，認爲中國文化重精神，是形而上之學，立意高超，而西方文化重物質，是形而下之學，祇追求功利的回報。他認爲，這種自以爲是的蒙昧態度，陷入傳統舊學的框囿而不自知，沒有自我反思的能力，無法吸收“素所未知”的新知識，也就無法開展並弘揚自己的文化傳統。嚴復非常清楚他翻譯西方經典的目的，是爲了介紹新知，打破中國傳統思維的封閉性，但是，作爲披荆斬棘的拓荒人，他

深知思想封閉者的頑固心理，必須因勢利導，以免遭到盲目衛道之士的攻訐。嚴復有其防身的策略，不會像許褚戰馬超那樣赤膊上陣，而是以桐城文章譯述赫胥黎、斯賓塞、穆勒、亞當·斯密、孟德斯鳩，博得晚清知識精英的贊許，文章深閱而傳入了新知義理。從文化變遷的角度而言，通過翻譯，以迂迴戰術來介紹西方思想，得到巨大的成功，產生了改變傳統思維體系的實效，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深遠的大事。以此類推，民國時期大量翻譯域外漢學的影響，也是不容忽視的思想史課題。

關於清末民初西方學術思維衝擊中國知識精英，顛覆傳統文化的知識結構，錢穆在《現代中國學術論衡》的序言中，從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，發出深刻的感慨，做了籠統的批評：“文化異，斯學術亦異。中國重和合，西方重分別。民國以來，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，務為專家，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。循至返讀古籍，格不相入。此其影響將來學術之發展實大，不可不加以討論。”錢穆所指出的問題，是傳統知識體系強調“通”，文史哲不分家，最崇尚通儒，而現代學術講究專業分科，各司其職，以至於讀不通古籍呈現的整體性知識思維。姚名達在撰寫《中國目錄學史》的時候，對西力東漸，西潮帶來的翻譯著作及新知新學，也有類似的感慨：“四部分類法，不合時代也，不僅現代為然。自道光、咸豐允許西人入國通商傳教以來，繼以派生留學外國，於是東西洋洋籍逐年增多。學問翻新，迥出舊學之外。目錄學界之思想不免為之震蕩。”這種對學術體系發生重大變化的觀察，反映了中國學人從晚清一直到民國，夾在東西方兩種不同思維體系的衝突中，身歷其境的切身感受，因此感觸良多。

二十世紀上半葉最能代表中國學術的通儒是王國維與陳寅恪，他們浸潤了經史子集的四部知識傳統，承繼乾嘉篤實的考據學風，却都經過西洋邏輯思維與實證科學的洗禮，參與中國知識結構的轉型。對西方現代知識結構如何在中國生根發芽，不但再三致意，並且以自己的學術實踐來努力促成。王國維早在一九〇二

年就寫信給張之洞，反對把經學列為大學分科之首，而主張效法西方與日本的大學，設立哲學科，明確指出知識結構的分類不可因循傳統，而必須另起爐竈。陳寅恪在一九二五年就清華大學建制的問題，寫了《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》，指出大學的職責在於學術之獨立，而中國學術界的情況令人十分不滿，必須認真效法西方學術的體制及實踐。他說：“蓋今世治學以世界為範圍，重在知彼，絕非閉門造車者比。”這兩位國學大師，對西方與日本的漢學研究十分注意，都是以開放態度對待域外漢學研究，集思廣益，以成其大家。

再回到“溫故知新”的歷代經解，說說文化傳承的闡釋學意義。劉寶楠在《論語正義》中指出，上古之時，文化知識是上層統治精英的家學，不再治理實際政事的長者可以傳遞德行的知識，可以為人師。“溫故而知新”，就顯示長者不忘舊時所學，且能吸收新知，繼承并發揚這種學術與政治合一的傳統。到了孔子之時，時代出現了變化，士大夫不見得能夠謹守家法，弘揚德行，也不一定能夠“為師”了。孔子之後，世變日亟，“道術為天下裂”，文化知識不再為少數統治精英所壟斷，也不必然與治理政事有關，學術在民間百花齊放，百家爭鳴。但是，學術知識發展的脈絡基本未變，仍然是要溫故知新，進德修業。從劉寶楠不經意的闡釋中，可以看到時代變遷影響了學術文化的內容，改變了知識結構的體系，但其內在發展的理路仍舊，還是需要舊學與新知的融合，才能有所發展。

劉寶楠還引述了劉逢祿的解釋：“故，古也。《六經》皆述古昔、稱先王者也。知新，謂通其大義，以斟酌後世之製作，漢初經師皆是也。”劉寶楠贊成這個說法，並指出，漢唐人解釋“知新”，大多數都沿用此意。也就是說，舊學是傳統的知識結構體系，新知是時代變化出現的新知識，必須相互斟酌，才能發揮得宜。至於如何對舊學“通其大義”，就見仁見智，各有說法了。從這個通達的詮釋來討論近代西學東漸的情況，我們可以看到，“溫故而知新”在民國學人的心底，是產生“傳統”與“現代”糾葛的心理陷阱，不易跨越。若依照朱熹的說

法，“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，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”，雖然在哲理上可以模模糊糊說通，但在清末民初的具體歷史環節，西學的新知屬於完全不同的知識體系，在原有的舊學脈絡中，根本無從立足，如何“其應不窮”？所以，真要放之四海而皆準，提升“溫故而知新”的普世意義，以理解域外漢學譯著與近代學術知識體系變遷的文化史意義，我們認為，皇侃、邢昺，一直到劉寶楠的闡釋，是比較合適，並與現代文化闡釋學的說法相近。

伽達默爾（Hans-Georg Gadamer）在他的名著《真理與方法》中，說到認知理性與文化傳統的關係，特別指出，人們通過理性，來判斷歷史文化中事實的真相，但是人的理性與生存環境息息相關，與傳統所衍生的豐富文化底蘊有關，不可能完全超越文化傳統的思維脈絡。他認為，人生活在文化傳統之中，就不可能“遺世獨立”，以全能超越的抽象思辨來認識傳統，甚至是批判或顛覆傳統。傳統是歷史文化延續與傳承的表徵，不會一成不變，而我們的認知理性也會因時代變遷，而不斷重新詮釋傳統。伽達默爾的闡釋學以西方文化傳統為例，說明新知如何納入傳統，而使文化傳統生機不斷，生生不息，與中國歷代經學家的說法（朱熹除外），有異曲同工之效。以此觀照民國時期的漢學譯著，我們認為，這批學術新知傳入中國，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繁衍與發展，實有承先啓後之功。

《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》的出版，最值得感謝的是南兆旭先生二十多年來搜羅的執着與努力。雖然這套叢刊不能窮盡民國時期的漢學譯著，但是，能匯集上百冊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國內不曾重印的學術著作，再度公之於世，總是功不唐捐的大功德。忝為本叢刊的主編，我面對這批民國學術材料，先是感到紛雜無章，有些原作者的學術素養也難副當前的學術標準，甚為猶豫。後轉念一想，這是上個世紀中國最紛亂時期的學術記錄，也是民生凋敝，國勢隕危，內亂外患交加之際，仍有許多學者孜孜矻矻，戮力翻譯域外漢學，為中國學術的傳承拓展新知的坦途，不禁肅然起敬，開始用心整理分類。掛一漏萬，在所難免，好在有學

殖豐贍的諍友擔任分卷主編，並撰寫各分卷前言，實在是衷心銘感。有傅杰教授負責“歷史文化與社會經濟”、戴燕教授負責“古典文獻與語言文字”、霍巍教授負責“中外交通與邊疆史”，吾道不孤矣。在整理編輯過程中，周威先生費心最多，也是我要衷心感謝的。

道術之存亡，全在人心之嚮背。這批民國漢學譯著重新問世，對我們生長在承平之世的學人，應當有激勵的作用，為學術研究多盡份力，讓中國學術發展更上一層樓。

鄭培凱

二〇一五年七月

— 前 言 —

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個黃金時期。從晚清的白話文運動，到白話文在民國初年被定為現代國語，中國的語言也就是“漢語”本身便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。在漢語的這一現代轉化過程中，“新文學”即白話文學、又或稱國語文學的異軍突起，又起到極為重要的推進作用。因此，現代的漢語和文學，從一開始就如雙生子一樣關係密切，不可切分。

當然，白話文與白話文學的興起，原因不止一個，但不能否認的是，在漫長的從“邊緣”變為“正統”的道路上，它們都受到過外來的語言和文學的刺激。這裏面既包括有現代漢語對“外來語”的吸納、新文學對外國文學的模仿，也包括了引入歐美日的方法，對漢語和文學加以研究。這個研究，還不單單是針對現代的漢語和文學，也針對古代的漢語和文學。

伴隨着漢語和文學自身的演變，而在語言學界及文學研究界發生的這些轉變，其實是中國學術在各個領域實現其現代轉型的一部分，也可以說是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的一個基礎。隨着對東洋、西洋從觀念到方法、從文獻到詮釋的全面開放，在一九三〇年前後，中國的語言學和文學研究也迎來了自己的黃金時代。

這個黃金時代出現的很多學術成果，都是當時中國學者在傳統學問的基石上，吸收外國的方法、結論得到的，如王力所說，那時的語言學，“始終是以學

習西洋語言學爲目的”，文學研究也莫不如此。所以，要想說明這個學術上的黃金時代究竟是什麼樣的，又如何形成，勢必要對當時的國外漢學知其一二，尤其要對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漢學書籍有一點瞭解。

語言學方面，自《馬氏文通》引入西方語法之後，在中國影響最大的恐怕就要數高本漢。從一九二七年的《左傳真偽考及其他》，到一九七二年的《中國聲韻學大綱》，他關於中國語言學的論著幾乎都有在中國（包括香港、臺灣）翻譯出版。據說早年間，在他的音韻學論文尚未譯成中文出版前，錢玄同就已經拿着其中幾頁，作上課的教材用。他的《中國語言學研究》的譯者賀昌群也曾說，在語言音韻學方面有所成就的學者，都是借高本漢之力。

文學方面，一個突出的現象是，日本漢學家的著作被翻譯出版最多。究其原因，大概是由於日本在歷史上受中國文化影響甚深，日本漢學家普遍有很好的漢學功底，到了明治維新以後，又先於中國接受歐美的思想、文化和學術，這兩方面的結合，促使日本漢學界產生出很多新的研究成果，其中就有像兒島獻吉郎、鈴木虎雄、本田成之、青木正兒、鹽谷溫、梅澤和軒等人的著作。這些涉及中國古典文學、藝術、思想等領域的論述，兼有東西之長，比較容易爲中國學界理解和認同。因此，在現代中國的文學史、文學批評史、藝術史、哲學史等學科領域，日本的研究範式一度相當流行。

說到海外漢學的影響，還不得不提及海外漢學論著的翻譯出版，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是又多又快，像成書於一九三二年的石田幹之助的《歐人之漢學研究》，一九三四年就有了中文譯本，就是典型的一例。這固然是由於當時的中國學界對於及時掌握海外漢學動嚮，有一種普遍的要求，可是不能忘記的是這些漢學論著的譯者，在這中間扮演了很重要的“驛騎”角色。

在這裏，也許不需要再去重復趙元任、羅常培、李方桂這一黃金組合翻譯高本漢《中國音韻學研究》的故事，不需要說明高本漢論著的大多翻譯者，如張世

祿、賀昌群等，也都是很好的專業學者。就連最早的《左傳真偽考及其他》，也是經胡適推薦，由當年聲名鵲起的新銳陸侃如、衛聚賢合作翻譯的。而在陸侃如看來，他們的譯介，就是爲了“東海西海互相印證”（譯跋）。

值得一說的，倒是譯過不少日本書籍、不限於漢學著作的孫俚工。孫俚工一九二四年赴日留學，他本來學的是德國文學，可是很快翻譯了鈴木虎雄的《中國古代文藝論史》、鹽谷溫的《中國文學概論講話》、本田成之的《中國經學史》、兒島獻吉郎的《中國文學通論》，興趣完全轉到對中國古典的研究。他在各書的譯序中，談到過對中國祇有整理國故保存國故的口號、成績却不如日本的想法（《中國古代文藝論史》），談到過他要借翻譯來使人看到在被我們自己拋荒的文學園地裏，經別人代耕，而有怎樣一番禾黍芃芃的景象（《中國文學概論講話》），也談到過如本田成之對於孔子“別開途徑”的理解，可爲中國學者取法實多（《中國經學史》）。對中日學界當時情況的判斷，大概是他譯書的動機。據說他在一九二八年回國任教後，短短幾年就編出幾百萬字的書來，其中像《中國文藝辭典》、《世界文學家列傳》、《中國語法講義》等，有人說都涉嫌抄襲日人（彭燕郊《那代人·關於孫俚工》）。這也大可說明他心目中的日本學術，不光是漢學，何等優越。當然，他翻譯鈴木虎雄、鹽谷溫的著作，按趙景深的說法，還是“對於中國文學的貢獻頗大”（《文壇憶舊·文人印象·孫俚工》）。

另外一位翻譯日文書極其勤奮的是王古魯。王古魯一九二〇年赴日讀的本來是英文系，一九二六年回國後也教過英文，但是他翻譯過的日本書籍，題材廣泛而雜駁，涉及小說與經史之學、語言文學、民族和對外關係，既有論述，也不乏考據。由於他對日本學界的追蹤，與他對中日關係的觀察是聯繫在一起的，因此，他在一九三一年翻譯的田中萃一郎《西人研究中國學術之沿革》、一九三四年編譯的《傅斯年等編著東北史綱在日本所生之反響》、一九三六年編寫的《最近日人研究中國學術之一斑》，都在中國學界引起過強烈的反響。在他翻譯的文

學論著中，最有名的恐怕就是青木正兒的《中國近世戲曲史》。吳梅早已表揚過他在翻譯中表現出的專業態度，即對青木正兒引書“無不一一檢校”，故“可為青木之諍友”（序）。一九五六年他寫信給青木正兒，又說此書不僅獲得“我國各方面極為重視”，還作為“中文本”，與王國維《宋元戲曲考》等六種，入選《蘇聯大百科全書》的“中國戲曲”條目，說明譯作本身成了經典。而這一次的翻譯，大概也為他後來到日本搜集古本小說、戲曲，最後成為造詣頗深的中國文學史研究專家做了很好的鋪墊。

中國現代學術史也應該銘記這些譯者的功勞。

戴 燕

二〇一五年六月八日於復旦

作者簡介

著者

石田幹之助（一八九一年—一九七四年），日本漢學家，生於千葉市，一九一六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（今東京大學）。一九二九年擔任日本大學教授，此外，還在國學院大學、慶應大學任教，並擔任東方學會、東方文化學會理事，日中文化協會、日本考古協會、日本民族學協會、史學會和國際文化振興會評議員，文物專門審議會、司法考試委員和日本圖書館協會顧問。著有《歐洲人的中國研究》、《長安之春》、《歐美的中國研究》、《關於南海的中國史料》和《唐史叢鈔》。由他主編的書籍有《中國文化論叢》、《考古學雜誌》、《蒙古學》、《中國》、《東亞》、《國學院雜誌》、《東洋思潮》及白鳥庫吉、市村瓚次郎、加藤繁、羽田亨各博士紀念論文集。

譯者

朱滋萃，資料不詳。

歐人之漢學研究目錄

	頁 數
一、緒論	5—7
二、古代和中世紀初期關於 <u>中國</u> 的知識	7—38
三、中世紀後期 <u>阿剌伯人</u> 底 <u>中國</u> 知識	39—61
四、 <u>蒙古</u> 人物興時代關於 <u>中國</u> 的知識	61—117
五、第十四・五世紀(從 <u>元</u> 至 <u>明</u> 初) <u>歐西</u> 底 <u>中國</u> 知識	117—144
六、 <u>東印度</u> 航路底發見和 <u>歐人</u> 東航：傳教師的 <u>中國</u> 研究和漢學底成立	144—268
七、附錄	269—336